

勉县武侯祠“唐碑”初考

陈显远

今陕西省汉中地区的勉县，即汉代的沔阳县，因其位于沔水（即汉水）之北，故名“沔阳”。三国时，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曹魏，六出祁山，其出屯汉中，即实驻沔阳。其死后，“遗命葬汉中定军山”。由今勉县渡汉水，南行十里，即到定军山西北脚下的诸葛亮墓地，人称“武侯墓”。

勉县武侯祠为全国奉祀诸葛亮最早建修的专祠，较四川成都武侯祠早建约五十年。据陈寿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载：“景耀六年春，诏为亮立庙于沔阳”。裴松之“注引”《襄阳记》曰“……步兵校尉习隆、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：‘……亮德范遐迹，勋盖季世，王室之不坏，实斯人是赖，而蒸尝止于私门，庙象阙而不立，使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追在昔者也。……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，立之于沔阳，使所亲属以时赐祭，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庙。断其私祀，以崇正礼’。于是始从之”。

按：蜀汉后主景耀六年，为公元二六三年，其春为诸葛亮建庙于沔阳墓地，其冬邓艾入川，后主投降，蜀汉即亡。这所建在墓地的武侯祠，至唐又经重建，历代相继补葺；至明武宗（朱厚照）正德八年（1513年），乃迁建于汉水之北，即为今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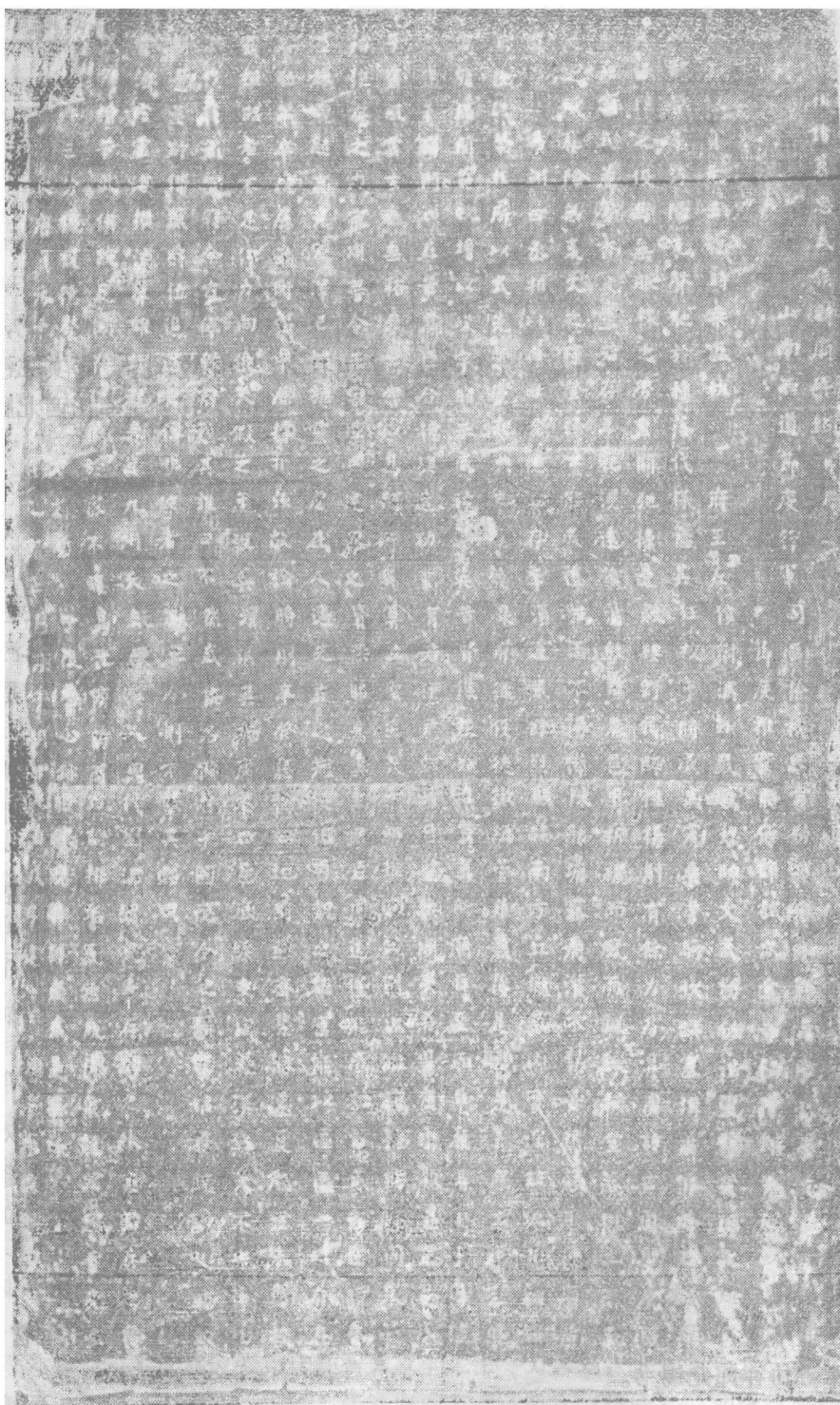
今勉县武侯祠位于县西四公里的公路南沿，座南向北，背濒汉水，面临公路。南北长约二百米，东西宽约一百二十米，有七院五十六间房舍，面积约三十亩。祠内碑碣林立，惟以大殿院东庑下的“唐碑”为最早，它刻于唐德宗（李适）贞元十一年（公元795年），较成都武侯祠的唐碑（刻于唐宪宗李纯的元和四年，公元809年），早刻十四年。以刻立时间而论，又为全国所有的武侯祠石碑之冠。

这通唐碑，园额、龟座，通高二百三十七、除额一百五十九、宽一百一十二、厚二十九厘米，二十三行，满行三十七字，共计八百多字。惜因刻时较早，历年颇久，经风雨剥蚀，间有泐字，又经后人改凿补刻，造成混乱。所补错字，需要考证；加之前代金石学者，对此碑文尚有未能全部理解而存疑者，这次拟一并考之，现将原泐字用方框占位，框后用园括号填入补字，全文录出如下：

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碑铭并序

山南西道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尚书、刑部员外郎、□□御史沈迴撰；节度推官将仕郎，试太常寺协律郎元锡书。

皇帝御极，贞元三祀，时乘盛秋，府王左仆射冯翊严□（武）总帅文武将佐，泊策轮突归之旅，疆理西鄙，营军沔阳，先声弛于种落，伐谋息其狂狡，于是威武震叠，虜



勉县武侯祠“唐碑”

李勉元摄

骑收迹，塞垣萧条，烽□（燧）灭焰，士无保障之役，马无服轡之劳，重关弛橈，边谷栖野，我师惟扬，则有余力。乃昇高访古，周览原隍，修敬兹庙，式荐馨香，光灵若存，年祀浸远。虽箫鼓忻奏，邑里祈禳，而风雨飘飏，祠堂落构，土阶衡数尺之崇，庭除无袤丈之隙，登降不能成礼，牲玉不能备陈。颓墉露肩，灌木翳景，樵苏互径，麋鹿走集。冯翊曰：“丞相以命世全德，功存季汉。遗风馀烈，显赫南方；丘垅□（南）山，实在兹地。荒祠偏倚，庙貌诡制，非所以式先贤崇祀典也”。乃发泉府，征役徒，撤编菅，薙丛薄，是营是葺，众工群至。缭以高墉，隔阂刍牧，增以峻宇，昭示威神。□（英）英昔贤，象设如在；翼翼新庙，日至而毕。顾谓小子，扬摧前烈，铭于庙门曰：在昔君臣合德，兴造功业，有若伊尹相汤，吕望兴周，夷吾霸齐，乐毅昌燕，是八君子皆风云玄感，垂裕来世。尝以为阿衡则尊立圣主，天下乐推；尚父则止仇□□（独夫），诸侯同举。管氏籍强齐之力，宗周无令王；乐生因建国之资，燕昭为奥主，君臣同道，仅能成功。惟武侯遭时昏乱，群雄兢起，高、光之泽已竭，桓、灵之虐在人。遇先主之短促，值曹魏之雄富，能以区区一州，介在山谷，驱羸卒，辅孱主，衡击中原，撑拒强敌，论时则辛癸恶稔；语地则燕齐势胜。迁夏、殷者，未可校功；霸桓、昭者，不足侔力。向使天假之年，理兵渭汭，其将席卷西邑，底绥东周，祀汉配天，不失旧物矣。洪伐彰彰，宜冠今古，倬轶前烈，其谁曰不然？武侯名迹，存乎《国志》，今之□（群）书；姑务统论，大略叙我新意。至于备载爵位，追述史传，非作者之愿也，今则不书。其铭曰：桓、灵济虐，云海横流。群雄崛起，毒蠹九州。天既厌汉，人思代刘。沸渭交争，存亡之秋。其谁存之，时惟武侯。伊昔武侯，踰足南阳。退藏于密，不耀其光。有时有君，将排垢氛。鱼脱溪泉，龙跃风云，先主赞绪，天下三分。馥馥德馨，悠悠清尘。前哲后贤，心迹暗沦。建兹新庙，式是梁珉。

大唐贞元十一年岁在乙亥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建。镌字□□□□明。

从碑文可以看出：蜀汉末年始建的武侯庙，经过五百多年，至中唐时期，已经坍塌破烂不堪，不能再作祭祀诸葛亮的场所，乃在原地重建了一座武侯庙，故名“蜀丞相诸葛忠武侯新庙”。这通唐碑，就是记叙建修“新庙”的动机和经过情况的。

关于后人对碑文磨泐所补的字，有的按文意尚属可从，有的就补刻错了。特别是把当时倡导建修新庙的地方长官名字补错，以致影响自清初以来，许多金石学家聚讼不休。

碑文第一行：“皇帝御极，贞元三祀（三年，787年），时乘盛秋，府王左仆射冯翊严□，总帅文武将佐，泊策轮突归之旅，疆理西鄙，营军沔阳。……”不幸“严”下一字磨泐，有人猜想是中唐时期权威人物严武倡导建修的新庙，便把“严”下那个泐字补刻为“武”。从此，有些盲从者便说是严武。如清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重修的《陕西通志》和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重修的《汉中府志》“祠庙”类俱载：“沔县武侯祠；唐贞元十一年，左仆射严武增修，有记”；道光初，祠中方丈虚白道人李复心编纂的《忠武侯祠墓志》著录此碑文时，也直称为“严武”。说明自清初以来，多数地方志，一致附和“严武”之说。

虽然有些著录者心知其非，没有苟同“严武”之说，不过只含乎其词，未能破的。如康熙《陕西通志》“艺文”类著录此碑文时，将“冯翊严武”改为“冯翊严氏”而已。

也还有人虽斥补为“严武”之非,另提一人,亦不确切。如清乾隆时(1736——1795年),两度做过陕西巡抚的毕沅,在他编的《关中金石记》卷四,《诸葛武侯新庙碑》篇载:“文称:‘贞元三年,府王左仆射冯翊总帅’者,谓舒王(李)谔为荆襄江西沔鄂节度诸军行营兵马元帅也”。毕沅认为倡修新庙的并非严武,看对了;但他强调是唐宗室舒王李谔,则错了。较毕沅稍晚一二十年的金石学家王昶,对毕沅认为是“李谔”之说,提出了非议。

王昶在他编的《金石萃编》卷一百三,《诸葛武侯新庙碑》载:“《关中金石记》定为舒王谔。《唐书·宗室传》‘舒王谊,初名谔,昭靖太子子,德宗爱其幼,取为第二子’。其为沔鄂节度,在李希烈反之时,正贞元三年事,宜乎合矣;而亦未尝有左仆射之官,且与冯翊严□亦无着。希烈之乱在淮蔡,舒王谔为节度在沔鄂,即今湖北汉阳州,非陕西汉中府之沔县,则《关中金石记》亦不确也。”

王昶接着又批判将此唐碑定为“严武”之讹:“碑云:‘府王左仆射冯翊严□……’,下泐一字,《陕西通志》云:‘唐贞元十一年左仆射严武增修有记’,即谓是碑所泐者乃‘武’字也。武为挺之子,《两唐书·传》称挺之为华阴人。严氏有冯翊、华阴二望,碑称‘冯翊’者,举其旧望也。惟碑有‘左仆射’之官,《两书严武传》所无;且《旧传》称武卒于永泰元年(《杜工部年谱》亦同),不应贞元三年严武尚在,是《陕西通志》与碑不合。”

王昶反对碑上补刻为“严武”及毕沅定为“李谔”的意见,都是正确的。因为严武在当时虽是权威人物,但其官居东川节度使,汉中勉县非其辖区,不会越境来倡修勉县武侯庙。特别是严武卒于唐代宗(李豫)永泰元年(765年),下距修勉县武侯新庙的唐德宗(李适)贞元三年(787年),已二十二年;再下距刻立此碑的贞元十一年(795年),就整三十年了,故与严武无着。

再以实物验证。现在碑上正文第一行“严”下所补之“武”,字形拙劣;尤其把“武”字的一捺,划了两道,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假的。更可证者,第一行补刻之“武”,恰巧与第二行原有“威武震叠”之“武”字并列,两相比较,真假立判,可以说是历史现实对作伪者的嘲弄。

王昶虽对碑上补刻的“武”字提出疑问,但他又犹豫地说:“严氏有冯翊(今陕西大荔县)、华阴(今陕西华阴县)二望,碑称冯翊者,举其旧望也”。“望”是门族、籍贯。王昶既提出碑补作“严武”不确,但又怀疑严武的旧籍在冯翊(这个问题,留在后面谈),模棱两可,未作断定,更没有提出这通唐碑上到底应该是严谁?

据我考证,初步肯定唐贞元时期,倡修勉县武侯新庙的是严震,如果要补碑上“严”下的泐字,应补为“震”,根据如下:

古代惯例,凡建修大型祠庙,一般都是地方长官作倡导,即是别人倡导,也要归功于地方长官,挂上他的头衔。当中唐时期,今汉中地区为山南西道,道治南郑(今汉中市),而道的最高行政长官为节度使,严震自唐德宗建中时期(780——783年),至贞元十五年(799年),一直任山南西道节度使。

据《新唐书·严震传》载:“建中中,剑南黜陟使韦桢,状(严)震治行为山南第一。乃赐上下考,封郾国公。治凤十四年,号称清严,远迩咨美,迁山南西道节度

使”。

建中四年(783年)唐德宗李适为避泾阳兵乱,由长安逃往奉天(今陕西乾县),叛兵跟踪逼迫,李适在奉天站立不住,于兴元元年(784年)二月,打算逃到汉中避难时,“(二月)丙寅,上将幸梁州(即汉中),山南西道节度使盐亭严震闻之,遣使诣奉天奉迎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三十)。“(贞元十五年,799年三月)癸巳,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薨”(同上书卷二百三十五)。这说明严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垂二十年,修庙、刻碑,都在严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任期中。再,今勉县东距当时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南郑,仅百里之遥,是严震的近畿属地,严震在勉县倡修武侯新庙,是理所当然的。

现在来谈谈“冯翊”问题。王昶既然批驳了碑上补刻为“严武”的错误,但又把碑上“府王左仆射冯翊严□总帅文武将佐”的“冯翊”理解为严武的旧籍贯,以致他自己举棋不定,难下断语。我以为“冯翊”是“冯翊郡王”的略语。因严震是四川盐亭人,与陕西冯翊无着,当唐德宗逃难到汉中时,严震为山南西道节度使,护驾有功,德宗对他“寻加检校户部尚书冯翊郡王”(《新唐书·严震传》)。这就足以说明碑称“冯翊”者,即严震被封为“冯翊郡王”无疑,进一步说明“冯翊”是爵号不是籍贯。

王昶又说:“惟碑有‘左仆射’之官,《两书·严武传》所无”。但《新唐书·严震传》却有:“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,这不是“左仆射”之官号是什么?

据上所谈,这通唐碑记载勉县武侯新庙是严震倡修的,可以定下来。但能不能对前人把“严”下磨泐了误补的那个“武”字,改为“震”字呢?我以为不能。因为古代撰文的惯例,对所颂扬的人,不能直书其名,以示尊敬,这是常识,何况此碑文作者沈迥,给他的上司严震歌功颂德,更不能直书其名。我以为原来碑上应该是个“公”字,现在从拓片上透过后补的“武”字看去,“公”字的残痕,犹依稀可见。如果要改,就应该改为“公”字,连起来,则为“冯翊严公”,便情通理顺了。

正文第六行“丘垅□(南)山”句,“丘垅”下泐一字,补刻为“南”字,我以为不妥。因“丘垅”指坟墓,诸葛亮的坟墓在定军山,怎能说成“南山”?且“南山”是泛指,不具体。应该补为“军”字。联系上下文意,即“丘垅军山,实在兹地”,译成现代话,便是“诸葛亮葬于定军山,坟墓就在这里”,语意便通顺了。

正文第十行“止仇”下泐二字,补刻为“独夫”。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引《竹垞盒·金石书目》云“‘止仇’下旧本已泐,今作‘独夫’二字,不可从”。

我以为“独夫”二字,既不可从,另拟易作“暴君”二字。联系这一段上下文为“尝以为阿衡则尊立圣主,天下乐推,尚父则止仇暴君,诸侯同举”。其“阿衡”指伊尹,“尚父”指吕望。若以“暴君”对上句“圣主”,则排偶、语意都较通顺了。暂拟改于此,质诸高明。

碑文还有一个前人不理解的悬案,今并释之。如文中有“在昔君臣合德,兴造功业,有若尹伊相汤,吕望兴周,夷吾霸齐,乐毅昌燕,是八君子,皆风云玄感,垂裕来世”一段话,这是把诸葛亮比作前代贤人的赞语。王昶在《金石萃编》的评语中,对“八君子”一词,持怀疑态度。他说:“碑叙伊尹、吕望、夷吾、乐毅只四人,而云‘八君子’,亦不可晓”。再如康熙《陕西通志》对“八君子”也存怀疑,它在卷三十二“艺文”类,

著录此碑文时，竟合乎其词地改为“是数君子”。

我以为如深究文意，对“八君子”之说不难理解。因碑文明明载有“在昔君臣合德”之语，那么，加上伊尹的君商汤王，吕望的君周武王，夷吾（管仲）的君齐桓公，乐毅的君燕昭王，四君四臣，不是“八君子”是什么？

关于这通唐碑的撰、书人问题，王昶在《金石萃编》的跋语里说：“此碑撰文者沈迥，书者元锡，两《唐书》俱无传。《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：‘（元）锡字君贶，与宰相元稹同系’，只载其官淄川王傅，而此碑结衔，乃为节度推官、将仕郎、试太常寺协律郎。又据《韩文考异》：‘衢州徐偃王碑，韩愈撰，福州刺史元锡书’。是锡又尝官福州刺史矣”。

我再补充一条资料。唐·韦绚《戎幕闲话·李汤篇》载：“至（唐宪宗元和）九年（814年）春，公佐（李汤字）访古东吴，从太守元锡泛洞庭，登包山，环炉会晤终夕焉。”。这说明元锡宝贞元十一年（795年）时，任山南西道节度推官，书写此碑，后调任福州刺史；再后又到元和九年（814年），调任东吴太守，可资佐证。

这通唐碑额，有元代一段题记：“历观先贤（指诸葛亮）事，大书厥书，积有年矣。往岁一日，风号雨暴，俄而倾颓，幸碑石无毁，非先贤之灵乎？爰卜良辰，扶而植之。大朝至元六年岁次己巳八月吉日，本贯辰州（今湖南沅陵县）人，利路副元帅韩重立”。

这段题记，记叙这通唐碑在南宋末年一次大暴风雨中扑倒了。到元至元六年（1269年），由利州路（治南郑）副元帅韩某重立起来。按元代“至元”年号有二，一般分称前后至元。这次重立唐碑是在前至元，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。附带说明，现存碑额的石色，与碑身迥异，想系原碑额被跌坏了，重立时配上的。

碑阴左半有南宋高宗（赵构）绍兴七年的祈雨题记：“知县事平阳台孟宗，因祈雨率巡检陇平寇泽、王普、秦亭刘安宪；监税汾阳柴永；监酒冯翊裴有、秦亭王恭祀祠下。绍兴七年（1137年）六月三日”。

碑阴右半有明代甘为霖题诗一首：“汉沔愜春雨，焚香在在求。三农惟有泣，二麦似无收。龙蛰已为异，鸠呼更可羞。至心如格感，三日倒河流”。款识：“戊戌清明尚书甘为霖题”。

按甘为霖系世宗（朱厚熜）嘉靖时人，曾奉命出巡陕西汉中一带，故有此题。这个“戊戌”为嘉靖十七年（1538年）。

碑左侧棱上有一行“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五月七日，崧山张颢过谒”的题记。

总的说来，这通唐碑，集唐、宋、元、明于一石，它是研究历代对诸葛亮评价和勉县武侯祠变迁以及历代政治、风尚的一个很好的实物资料，应当妥加保护，让它永远作历史的见证。上面肤浅地作了些考证，旨在抛砖引玉，希望广大的考古学家和历史爱好者，多加指正，并对此唐碑作进一步的研究考证。